

越南数字文化主权构建： 技术民族主义的视角

陈海丽¹, 白如纯²

(1. 广西民族大学 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数字文化主权的边界侵蚀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挑战。越南作为东南亚数字化转型较快的后发国家,正面临跨国平台规制约束、数据外流与技术依赖以及文化认同削弱等多重压力。为应对上述挑战,越南以技术民族主义为战略驱动,围绕文化治理、资源控制和文化价值传播3个维度,推进系统性的数字文化主权构建:在治理权层面,提升文化战略地位、完善法制规范与推动跨部门协同治理,构建数字空间的属地管辖权;在资源控制权层面,通过本土平台生态建设与文化数据归属把控,降低对跨国平台的结构性依赖;在价值传播权层面,通过技术赋能、文化铸魂、政治立基等多元路径培育数字公民,提升国家在数字空间的认同建构能力。越南的实践表明,“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在数字文化这一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领域实现“主权超车”,其经验对后发国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越南;数字文化主权;技术民族主义;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26)03-0068-14

DOI:10.14073/j.cnki.nywtj.2026.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技术在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领域的深度嵌入,全球文化版图与权力结构正在经历剧烈的重塑。在这一进程中,传统国家文化主权不仅面临物理疆域向虚拟空间延伸的治理难题,更面临着数字基础设施控制权转移与算法逻辑渗透所引发的权力重构。这一主权张力在“全球南方”国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何在释放技术红利的同时抵御数字依附与文化霸权,已成为关乎国家治理能力与文化安全的重要议题。

在众多面临数字文化主权挑战的“全球南方”国家中,越南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性与分析价值

收稿日期:2026-05-16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东盟的对冲策略与越南的角色研究”(22XGJ004);广西民族大学重点项目“数智时代越南家庭德育对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培养”(2024MDSKZD02);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改项目“价值铸魂·数智赋能·三域贯通:越南语专业核心课程群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2025JGB184);南宁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越南人工智能发展对南宁面向东盟深化数字合作的机遇与挑战”(NNSK2026-47)

作者简介:陈海丽,女,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白如纯,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的研究样本。首先,越南作为东南亚数字化转型较快的后发国家,面临着较高的数字技术依附与文化渗透双重风险;其次,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安全在其治理话语中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形成一套独特的国家主导型数字文化主权建构路径。

2026年,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越共十四大”)首次将“数字文化”写入党代会文件,将文化思想安全与数据自主纳入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同年,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的《关于发展越南文化建设的80号决议》(以下简称《80号决议》)4次提及“数字文化主权”(chủ quyền số văn hóa),将文化安全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框架,并强调国家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内容发展,以及数据管理均应与数字文化主权紧密联系。^① 2025年,越南颁布的《关于批准数字政府的发展计划》从技术维度出发,将网络安全、个人数据保护和数字主权确立为数字化进程的核心。^②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越南在数字时代正重新定义国家文化主权的行使范围,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构建数字文化战略。

针对数字空间中的主权问题,学界已开展了一些前期探索,主要呈现出3条研究脉络:第一,数字主权的本体论与地缘博弈研究。既有文献主要聚焦于数字主权的概念界定、核心内涵、价值功能^③及地缘政治博弈。研究多以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为主要分析对象,剖析其围绕底层数字基础设施、跨境数据流转等展开的规则竞争。部分国内学者将研究视线转到区域层面,探讨东盟成员国在数字安全挑战下的区域治理合作,^④分析数字技术民族主义对东盟数字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差异化阻碍。^⑤ 然而,以上研究大多侧重于技术层面,对作为软实力载体的数字文化主权关注不足。

第二,数字主权的“文化转向”与制度路径探索。随着算法推荐与内容出海对本土价值体系的隐性穿透,数字主权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属性逐渐进入学者视野。在国际学界,相关研究探讨了文化遗产机构如何通过去殖民化叙事重夺跨国基础设施中的数字话语权,^⑥以加拿大为案例分析如何通过调整文化贸易政策来保障数字生态中本土文化表达的可见性。^⑦ 但以上研究大多置于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框架下展开研判,在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下数字文化主权的建构逻辑时存在一定局限性。国内学者分别从法治与技术视角分析了国家文化数字化的布局,^⑧然而较少从技术民

① “Nghị quyết về phát triển văn hóa Việt Nam”, Bộ Văn hóa, Thể thao và Du lịch, 2026-01-07, <https://bvhttdl.gov.vn/ngphi-quyet-cua-bo-chinh-tri-ve-phat-trien-van-hoa-viet-nam-20260113095119168.htm>.

② “Chương trình phát triển Chính phủ số: Mục tiêu xây dựng Chính phủ thông minh vận hành bằng dữ liệu và AI”, Bộ Khoa học và Công nghệ, 2025-12-02, <https://mst.gov.vn/chuong-trinh-phat-trien-chinh-phu-so-muc-tieu-xay-dung-chinh-phu-thong-minh-van-hanh-bang-du-lieu-va-ai-197251202051915596.htm>.

③ 张吉豫:《数字法理的基础概念与命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5期,第47页;刘洁、刘战伟:《平台基础设施、数字主权与新地缘政治》,《新闻与传播评论》2025年第3期,第97页;范玉刚:《从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明自信——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使命担当》,《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36页。

④ 姜志达、李佳、韩卓希:《东盟数字安全挑战与中国—东盟治理合作》,《南洋问题研究》2025年第4期,第87页。

⑤ 邹春萌、朱博特:《东盟国家数字技术民族主义与区域数字一体化》,《南洋问题研究》2026年第1期,第105页。

⑥ Susannah Montgomery and Ben Wagner, “Digital Cultural Sovereignty: Navigating the Digital Landscape of European 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ions with a Decolonial Lens”, in Ben Wagner, Matthias C. Kettemann, Kilian Vieth-Ditlmann and Susannah Montgomery,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Human Right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Second Edition,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5, pp. 389-405.

⑦ Patricia Goff, “Cultural Sovereignty in a Digital Age”, in David Carment, Laura Macdonald and Jeremy Paltiel, eds., *Canada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Canada Among Nations 2021*,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p. 191-208.

⑧ 孙强:《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现的法治化原则与进路》,《江汉学术》2024年第5期,第46页;张铮、倪彬彬:《文化大模型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融生逻辑与规制路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81页。

族主义的视角加以阐释。

第三,技术民族主义的国别化实践研究。学界对技术民族主义的研究正经历从“传统产业保护”向“数字主权防御”的范式转移,部分学者已关注到老挝等“全球南方”国家在国家建设中将技术自主作为集体身份认同和国家生存底线的实践。^① 现有研究对越南的案例剖析主要从网络安全和政策管理^②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未能将技术民族主义与数字文化主权进行系统性关联。

鉴于此,本文将技术民族主义的三维动机具象化,并映射于“文化治理—文化资源控制—文化价值传播”的递进型框架,深入剖析越南在数字时代应对数字文化主权的挑战与实践路径,拓宽数字文化主权的国别研究范畴,为“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化浪潮中化解主权困境、维护文化安全提供参照。

二、技术民族主义与数字文化主权的内在逻辑

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将技术控制与国家生存深度绑定的战略思潮,为理解当前全球数字博弈提供了关键视角,也为厘清技术民族主义与数字文化主权之间的内在关联,审视越南应对跨国数字权力扩张的本土化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一) 技术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与现实表象

“技术民族主义”最早源于20世纪末,以美国在科技领域对日本的防范与压制为表象。最初泛指通过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扶持本国高科技产业的重商主义行为。^③ 彼时,该概念主要聚焦于经济竞争层面,强调通过国家干预实现技术追赶与产业升级。进入21世纪,随着地缘政治与数字技术的深度纠缠,技术民族主义的内涵和表象发生了深刻演变,逐渐从单纯的经济工具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当前学界对技术民族主义的探讨已超越传统经济学范畴,呈现出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多维度的理论面向:一是地缘政治领域中的博弈动机。技术民族主义是特定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下的产物,提倡国家在科技议题上采取防御性或进攻性的主动干预措施。^④ 二是经济领域的战略重商动机。技术民族主义主张将技术创新、科技企业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直接绑定,属于现代重商主义行为。^⑤ 三是社会学范畴的身份认同动机。技术民族主义被视为民族主义在科技领域的延伸,强调通过掌握核心科技和技术自主维系国家安全底线与集体身份认同。^⑥

简而言之,数字时代的技术民族主义将“技术控制力”与“国家生存权”深度绑定。当这种安全导向的治理逻辑从经济、军事等物理领域延展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时,其核心诉求便转化为对数字文化边界的维护。技术民族主义的三重动机结构性地投射为国家对数字空间文化主权的争夺,构成本文后续分析的理论起点。

① 苏世天:《全球南方视角下的“技术民族主义”——以老挝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为主线》,《东南亚研究》2025年第5期,第114页。

② 李春霞:《越南国家网络安全:认识、实践及特点》,《国家安全论坛》2024年第3期,第73页;Vũ Cẩm Lệ, “Chủ quyền văn hóa số Việt Nam: từ thách thức nền tảng đến chiến lược quản lý”, *Tạp chí Quản lý nhà nước*, 2026-06-20, <https://www.quanlynhanuoc.vn/2026/06/20/chu-quyen-van-hoa-so-viet-nam-tu-thach-thuc-nen-tang-den-chien-luoc-quan-ly>.

③ 沈辛成:《技术民族主义:源流、局限与前景》,《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2期,第27页。

④ 李峥:《全球新一轮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第31页。

⑤ Alex Capri, *Techno-nationalism: The US-China Tech Innovation Race—New Challenges for Markets, Business and Academia*, Hinrich Foundation, 2020, p. 5.

⑥ 王琴、欧阳果华:《理解技术民族主义:集体记忆、身份认可与国际竞争基于联想5G投票事件的观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59页。

(二) 从数字主权到数字文化主权的概念延展

数字主权最初由欧洲国家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垄断而提出,意指国家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数字网络、数据资产及技术设施拥有最高控制权。2011年,法国空中摇滚广播电台(Skyrock)的首席执行官皮埃尔·贝朗格(Pierre Bellanger)首先尝试定义“数字主权”,认为“数字主权是通过使用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来体现和引导对我们当下和未来命运的控制”。^①在此阶段,数字主权主要聚焦于物理与数据层面,涵盖网络主权、数据主权和数字技术主权。然而,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在数字生态中,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形塑了特定的行为准则和伦理标准,即“数字文化”。^②数字文化关注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如何与数字技术互动。^③随着算法推荐、跨境内容输出等技术机制对本土价值观的隐性穿透,单纯的硬件防御难以有效抵御外部意识形态的渗透。这种技术非中立性直接推动了数字主权范畴的拓展,使其向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延展,从而衍生出数字文化主权的概念。

数字文化主权是传统国家主权在文化数字化领域的具体外化,指主权国家对其政权管辖范围内的数字文化数据享有的生成、创作、传播、控制、利用、保护等权力。^④具体而言,数字文化主权包含3个基本维度:一是文化治理权,即国家制定数字空间文化准则与法律框架的权力,确保数字空间的规则制定权不被跨国资本或外部力量所取代。二是文化资源控制权,即确保本土文化数据的安全把控,防范数字时代文化资源的非对称流失与不当利用,既体现对知识、对创造者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对自身正当权益的依法保护。三是文化价值传播权,即掌握信息分发的主导权,避免信息分发被外部算法主导,使本土价值观在数字公共领域保持主导地位。上述3个维度存在递进关系:文化治理权是制度前提,为国家介入数字文化空间提供合法性;文化资源控制权作为物质支撑,为上述主权意识的落地提供平台、数据与技术条件;文化价值传播权是最终指向,确保国家对规则与资源的掌控,在数字公共领域确立本土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主权、数字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安全在分析层次与功能指向上存在差异。数字主权主要聚焦国家或政府层面对数字网络、数据资产及技术设施的管辖权,解决的是“谁拥有底层控制力”问题。数字文化主权是数字主权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其分析对象从物理设施与数据流转向文化内容的生产规则、文化资源的归属以及文化价值的传播秩序,解决的是“谁定义数字空间中的文化意义”的问题。国家文化安全是数字文化主权所服务的宏观战略目标,不限于数字空间,而涵盖一切可能威胁国家文化主权、意识形态稳定与集体认同延续的风险领域。^⑤

简而言之,数字主权提供技术底座,数字文化主权在此底座之上实现对文化领域的具体管辖,二者共同汇入并服务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总体目标。本文的分析对象定位于中间层即数字文化主权,以数字主权的技术条件为前提,同时以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于越南在数字空间争夺文化治理权、文化资源控制权与文化价值传播权的具体实践过程。

(三) 技术民族主义驱动数字文化主权建构的逻辑理路

技术民族主义的3个动机与数字文化主权的3个核心维度之间存在结构性对应关系。

① Farid Gueham, *Digital Sovereignty—Steps towards a New System of Internet Governance*, Paris: Fondation pour l'innovation politique, 2017, p. 9.

② Bộ Thông tin và Truyền thông, *Cẩm nang Chuyên đổi số*, Hà Nội: Nxb Thông tin và Truyền thông, 2021, tr. 74.

③ Phạm Thu Hà, “Vai trò của xây dựng văn hóa số trong chuyển đổi số quốc gia”, *Lý Luận Chính Trị*, 2024-02-29, <https://lyluanchinhtri.vn/vai-tro-cua-xay-dung-van-hoa-so-trong-chuyen-doi-so-quoc-gia-4292.html>.

④ 孙强:《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现的法治化原则与进路》,《江汉学术》2024年第5期,第46页。

⑤ 申来津、乔奕钦:《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国家文化安全风险及其防范化解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1期,第155页。

其一,国际博弈动机投射为对文化治理权的争夺。技术民族主义在国际博弈中的核心关切是规则主导权,关涉标准制定和边界规范。这一逻辑延伸至文化领域,表现为国家通过属地化法律和准入机制重塑规制权威,防止主权法律秩序被跨国平台的社区准则所消解。

其二,战略重商动机体现为对文化资源控制权的争夺。重商主义的要义在于避免关键要素形成外部依赖。在数字文化领域则体现为对文化数据本地化存储的规制,本土平台的替代性建设以及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自主掌控,防止文化生产的核心要素被跨国平台占有。

其三,身份认同动机表现为对文化价值传播权的争夺。技术民族主义将技术自主视为维系集体身份认同的底线。在数字文化领域则表现为通过政治立基与社会动员,将国家层面的主权诉求转化为民众的日常数字实践,通过培育“数字公民”来重塑国家在算法时代的价值传播主导权。

在政策实践中,三重动机往往相互渗透、交叉驱动。例如,数据本地化立法既出于战略重商的资源控制考量,也服务于国际博弈中的规则主权诉求;本土平台的扶持既回应了资源自主的经济需要,也承载着身份认同建构的文化使命。尽管现实政策边界存在交叉,但为了在复杂的互动网络中厘清核心矛盾并建立可操作的观察路径,本文以上述3组对应关系作为分析主线,凸显每一维度的核心驱动逻辑,深入剖析越南在技术民族主义驱动下构建数字文化主权的现实挑战与应对。

三、越南数字文化主权面临的挑战

当前,数字技术正深刻重构越南文化主权的存续逻辑与运行机制。越南学者潘青海认为:“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跨境平台日益主导着本土媒体格局和民众娱乐生活,我们的文化安全、数字文化主权正遭受严峻挑战。”^①这种挑战并非单一维度的外部冲击,而是分别从文化治理权、文化资源控制权与文化价值传播权3个维度对越南文化主权构成多重挑战。

(一) 文化治理权的侵蚀:规则真空与治理滞后

作为数字文化主权的制度前提,文化治理权的核心在于主权国家对本国数字空间的规则制定权与秩序维护权。然而,越南在这一领域的属地管辖正面临着外部地缘话语的“长臂管辖”与内部治理滞后的双重压力。

一是西方“数字自由”的话语施压与跨国平台的“超主权”长臂管辖。部分西方国家及非政府组织频繁利用“网络自由”指数等指标对越南施加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越南治理本国数字空间的话语合法性。与此同时,跨国平台的“长臂管辖”与越南本土法律产生直接冲突。例如,脸书(Facebook)平台频繁以“违反社区标准”为由,对越南官方媒体及主流博主账号进行限流或封禁。2020年,越南信息传媒部曾公开批评脸书涉嫌“操纵社群标准”以屏蔽支持政府的言论。^② 尽管跨国平台常以“规则统一”或“算法中立”为由,为其内容治理辩护,但在越南看来,这些不受越南法律直接管辖的境外商业机构,正在行使某种“超主权”的政治筛选权,构成对越南国内信息秩序的隐性干预。

二是法治规范滞后于技术发展。近年来,越南通过2018年《网络安全法》《关于管理、提供与使用互联网服务和网络信息的第147/2024/ND-CP号议定》以及2026年7月1日起生效的最新《网络安全法》,逐步搭建起数字平台监管和网络安全保护的制度支柱。然而,面对跨境平台瞬息万变的算法结构与商业分发模式,成文法的修订与出台往往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滞后,导致监管理念

^① Phan Thanh Hải, “Nghị quyết 80-Nền tảng và động lực phát triển văn hóa bền vững”, *Tạp chí Đông Nam Á*, 2026-01-19, <https://tapchidongnama.vn/nghi-quyet-80-nen-tang-va-dong-luc-phat-trien-van-hoa-ben-vung/>.

^② “Ngăn chặn xử lý các thông tin xấu độc trên mạng xã hội”, Bộ Thông tin và Truyền thông, 2021-03-15, <https://mic.gov.vn/bo-tttt-kien-quyet-ngan-chan-xu-ly-cac-thong-tin-xau-doc-tren-mang-xa-hoi-197152518.htm>.

与措施陷入“落后于技术”快速发展的尴尬境地。^① 目前,越南虽已在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信息管理等领域完成立规建制,但在执法层面仍缺乏足够灵活的响应机制以适应全球化技术环境的快速变化。^②

(二)文化资源控制权的流失:数据外流与平台依赖

文化资源控制权是数字文化主权的物质基础,表现为国家对文化生产要素(尤其是数据要素)和基础设施平台的自主支配能力。当前,越南在数字文化生产链条中面临数据要素非对称流失与境外平台依赖双重问题。

一方面,本土数据流失严重。越南学者何青云认为,数据控制权已成为一种战略性文化资源,谁掌握了这些数据,谁就能掌控广告市场,并预测甚至引导社会情绪的走向。^③ 当前,越南海量用户的多维数据大量流向境外服务器,其处理与分析过程很大程度受制于外部机构设计的算法。用户的审美偏好、行为习惯等数据被高度资产化,成为跨国平台商业运营的核心资源,脱离了数据生成国的有效监管。这种数据外流给越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越南国家网络安全协会(NCA)统计,仅2024年一年,越南用户因数字欺诈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8.9万亿越南盾(约7.4亿美元),其中不少案件是利用跨境平台上的用户行为数据而实施的精准诈骗。^④ 同时,越南数字广告市场的收入大量流向脸书和谷歌(Google)等境外平台,导致本土媒体的发行量和数字广告收入这两大赖以生存的传统支柱受到严重冲击。^⑤

另一方面,自主平台缺乏竞争力,内容分发渠道受制于人。在大数据和算法之下,信息内容的分发(精准推送)与信息内容的采编一样,成为传播权力的核心要素。^⑥ 因此,把握自主技术平台意味着对内容分发渠道的战略主导。越南人民安全大学政治安全学院院长陆清雄认为,随着跨境数字平台在内容分发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公众话语、品味和行为日益受技术机制和超出国家直接控制范围的商业利益影响,这将会削弱国内文化机构在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⑦ 尽管越南在网络安全监控、电子邮件保护和信息安全评估等领域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是越南本土网络安全产品的使用率仅约24.77%。^⑧ 根据2024年决策实验室(DecisionLab)的数据,在一项关于信息分发权力的“新闻资讯获取渠道”调查中,高达61%的越南用户通过脸书阅读新闻,40%的用户依

① Vũ Cẩm Lệ, “Chủ quyền văn hóa số Việt Nam: từ thách thức nền tảng đến chiến lược quản lý”, *Tạp chí Quản lý nhà nước*, 2026-06-20, <https://www.quanlynhanuoc.vn/2026/06/20/chu-quyen-van-hoa-so-viet-nam-tu-thach-thuc-nen-tang-den-chien-luoc-quan-ly>.

② “‘Chủ quyền văn hóa số’ trước kỳ nguyên nền tảng”, *Báo Nhân Dân*, 2026-03-23, <https://nhandan.vn/chu-quyen-van-hoa-so-truoc-ky-nguyen-nen-tang-post949745.html>.

③ “‘Chủ quyền văn hóa số’ trước kỳ nguyên nền tảng”, *Báo Nhân Dân*, 2026-03-23, <https://nhandan.vn/chu-quyen-van-hoa-so-truoc-ky-nguyen-nen-tang-post949745.html>.

④ Nguyen Thanh Binh, “Awareness Vaccine for Vietnam’s ‘Perfect Storm’ of Online Scams”, Tech for Good Institute, November 20, 2025, <https://techforgoodinstitute.org/insights/country-spotlights/awareness-vaccine-for-vietnams-perfect-storm-of-online-scams/>.

⑤ “Vietnamese Media Navigate Economics of Journalism in Digital Age”, VietnamPlus, June 22, 2026, <https://en.vietnamplus.vn/vietnamese-media-navigate-economics-of-journalism-in-digital-age-post346942.vnp>.

⑥ 曾白凌:《媒介权力:论平台在算法中的媒体责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10期,第31页。

⑦ Lưu Thanh Hùng, “Không gian số và những thách thức mới đối với bảo đảm an ninh văn hóa”, Trường Đại học An ninh nhân dân, 2026, <https://dhannd.bocongan.gov.vn/khong-gian-so-va-nhung-thach-thuc-moi-doi-voi-bao-dam-an-ninh-van-hoa-a-4107>.

⑧ “Tạo ‘hệ miễn dịch số’ cho cộng đồng”, *Báo Nhân Dân*, 2026-05-16, <https://nhandan.vn/tao-he-mien-dich-so-cho-cong-dong-post962512.html>.

赖谷歌,而使用越南本土新闻网站或应用的网民仅占 38%。^① 这些现象表明越南在信息分发主导权方面处于被动地位。

(三) 文化价值传播权的旁落:文化逆差与认同危机

文化价值传播权是数字文化主权的最终指向,关乎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文化认同的向心力与主流价值观的社会整合效能。当前,越南主流价值观在数字空间的传播效能正被跨国平台的算法逻辑系统性削弱,对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造成消极影响。

一方面,越南本土文化内容在算法竞争中处于明显的文化逆差状况。尽管越南本土拥有用户体量庞大的 Zalo 社交平台,但在更广泛的数字文化消费领域,脸书、油管(YouTube)和 TikTok 仍占据主导地位。越南本土用户大量消费美国、韩国、中国等国家的内容。以越南音乐和视频消费为例,据 Statista 调查数据,油管在越南不同年龄段用户中仍是最受欢迎的音乐流媒体平台。^② 这意味着越南文化内容的生产者不得不依附于外国平台的分发规则和算法推荐逻辑,才能触达本国受众。在高度个性化、娱乐化的分发机制下,弘扬主流价值的内容往往遭到算法的冷遇和“中和”,而西方消费主义话语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产品则借助算法推荐获得传播优势。越共十四大曾指出对文化的投入未达预期。^③ 其原因之一在于文化投入发挥效能的场域已从剧场、影院等传统物理空间转移到由跨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算法平台。这种空间维度的转移,导致传统的国家财政投入模式难以直接转化为虚拟空间中的数字文化话语权,进而在客观上加剧越南在数字内容竞争中的文化逆差困境。

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文化真实性危机与认同消解。2025 年 10 月,越南互联网用户达到 8560 万,占总人口的 84.2%。^④ 庞大的用户基数放大了算法偏好对公共价值观的扭曲效应。在 TikTok、脸书和油管平台上,涉及极端、有争议或情绪化的内容往往得到迅速传播,因为它们能在短时间内吸引社交网络用户的关注。相关案例显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历史人物虚假影像,伪造政治言论,合成虚假政务文件,捏造党和国家领导人音视频的现象层出不穷。越南官方认为,此类信息一旦经社交媒体算法推荐广泛传播,将对执政党的公信力及主流历史叙事构成挑战,并削弱基于民族文化的国家认同基础。^⑤

四、越南捍卫数字文化主权的路径选择

越南数字文化主权面临的挑战并非单纯的外部冲击,而是外部侵蚀与内部短板相互叠加的结果,集中体现为文化治理权的真空、文化资源要素的外流与传播渠道的对外依赖。对此,越南以技

① “Vietnam’s Digital Platforms Compete Head-on with Global Giants”, VietNamNet Global, November 5, 2024, <https://vietnamnet.vn/en/vietnam-s-digital-platforms-compete-head-on-with-global-giants-2338717.html>.

② “Leading Apps to Music Streaming Vietnam Q2 2024, by Generation”, 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September 16, 2024,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55930/vietnam-leading-apps-for-music-streaming/>.

③ “Báo cáo chính trị của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khóa XIII tại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XIV của Đảng”, Hệ thống Tư liệu-Văn kiện Đảng, 2026-02-11, <https://tulieuvankien.dangcongsan.vn/bo-chinh-tri-ban-bi-thu-ban-chap-hanh-trung-uong/dai-hoi-dang/lan-thu-xiv/bao-cao-chinh-tri-cua-ban-chap-hanh-trung-uong-khoa-xiii-tai-dai-hoi-dai-bieu-toan-quo-lan-thu-xiv-cua-dang.html?categoryId=3000412>.

④ “Digital 2026: Vietnam”, DataReportal, November 8, 2025,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6-vietnam>.

⑤ “Bài tuyên truyền nhận diện hành vi giả mạo bằng AI—Điểm mới quan trọng của Luật An ninh mạng 2025”, Công an tỉnh Tây Ninh, 2026-06-20, <https://congan.tayninh.gov.vn/vi/chi-tiet-tin-tuc?Id=269125>.

术民族主义为战略驱动,通过制度升级、平台建设与公民培育等路径,推进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数字文化主权构建(见图1)。



图1 越南数字文化主权构建的逻辑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重塑文化治理权：制度体系与规制能力的数字化升级

文化治理权是数字文化主权的制度支柱与管辖边界,本质在于确立数字疆域内的规制权威与主权管辖。在技术民族主义的视域下,地缘博弈动机促使国家避免将本国数字空间的秩序裁量权让渡给跨国平台的“商业自治”或域外的话语霸权。越南主要通过战略升级、立法构建与跨部门协同治理,构建数字空间的文化治理权。

首先,对文化进行战略性定位。技术民族主义在国际博弈中的核心关切是规则主导权,而要在文化领域行使这一主导权,国家必须首先赋予文化以足够高的战略定位,才能为后续的立法构建和制度创新提供政治正当性与资源动员依据。越南的文化战略定位正是遵循这一逻辑,经历了持续升级。2014年,越共十一届九中全会首次将文化置于与经济、政治、社会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2021年,越共十三大提出让文化真正成为发展国家和保卫国家的内生力量和动力,强调要有效发挥大众传媒和社交网络的作用;^①同年,在越南全国文化会议上,时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以“文化在则民族在”阐明文化对国家安全与民族存续的重要意义。^②2026年,越共十四大召开前夕,越共中

① “Báo cáo chính trị của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Đảng khoá XII tại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XIII của Đảng”, Hệ thống Tư liệu-Văn kiện Đảng, 2021-03-23, <https://tulieuvankien.dangcongsan.vn/ban-chap-hanh-trung-uong-dang/dai-hoi-dang/lan-thu-xiii/bao-cao-chinh-tri-cua-ban-chap-hanh-trung-uong-dang-khoa-xii-tai-dai-hoi-dai-bieu-toan-quoc-lan-thu-xiii-cua-3734?categoryId=104000017>.

②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越南全国文化会议上的讲话》,毛玉文、陈海丽译,《南洋资料译丛》2022年第1期,第35页。

央政治局颁布《80 号决议》,强调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国家实现快速且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重要内生资源和核心驱动力”,同时是“维系国家运转的支柱和调节体系”。^① 越共十四大进一步制定了将国家总预算支出中至少 2%用于文化建设的量化指标,^②表明越南文化战略从政策倡议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投入承诺。《80 号决议》将国家文化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内容发展以及数据管理与数字文化主权紧密联系,提出在数字转型和国际融合背景下构建“文化阵势”的任务。^③由此可见,文化战略地位的持续升级,为越南数字文化治理权的构建提供了政治前提与制度空间,推动其数字文化主权构建逐步从话语层面的宣示,转向具备可操作性的治理实践。

其次,构建相应的法律体系。法律是主权最刚性的外在投影。越南通过建立涵盖内容管控、数据本地化、实体落地及算法监管的多层级立法矩阵,逐步收回数字空间的属地管辖权。《网络安全法》自 2019 年 1 月起正式实施以后,不仅赋予了政府较为广泛的网络内容审查权限,还明确了跨境数据本地化存储的硬性要求,迈出了越南数字主权边界清晰化的第一步。越南公安部依据该法律,加强对脸书和油管等海外社交平台的监管,明确指向散布损害越南主权、抨击越共领导人与社会主义体制、破坏民族团结等违法内容。2021 年 8 月,越南政府颁布第 85 号法令,规定电商服务属于对外资限制性行业,外国投资者必须在越南国内完成注册方可开展经营活动。^④ 2025 年 6 月,越南国会通过的《数字技术产业法》,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的管辖,要求跨境平台必须在越南设立法律实体或指定可信代理人,限制了跨国平台此前事实上享有的域外法律管辖豁免空间。

2025 年 12 月,越南国会对《网络安全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收紧了对跨境大模型的数据存储限制。2026 年出台的《人工智能法》规定,向越南用户提供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境外组织必须在越南境内设立实体,并对因算法歧视、深伪传播等造成的社会性损害承担法律责任。这使越南成为东南亚首个以专门立法方式建立较完整人工智能监管框架的国家。^⑤ 上述法律共同构成越南数字文化治理的制度矩阵,从内容管控、平台属地化到发展主导权层层递进,使越南得以在数字文化领域逐步将主权主张转化为可执行的法律规范。

最后,跨部门综合治理。如果说法律体系的完善构成了越南数字文化治理的制度基础,那么国家网络安全指导委员会则形成了其制度运转的组织中枢。2026 年 6 月,越南总理签署第 1100/QĐ-TTg 号决定,进一步调整国家网络安全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涵盖越共中央宣教与民运部、国防部、政府办公厅、公安部、外交部、科技部、财政部、司法部、文化体育与旅游部、国家银行以及越南电视台、越南之声、越通社等机构。^⑥ 其组成兼具“安全”与“文化治理”的双重属性,标志着越南数字文化治理已从单一的网络安全或内容监管,转向多部门参与的综合治理模式,有助于克服部门分

① Phan Thanh Hải, “Nghị quyết 80-Nền tảng và động lực phát triển văn hóa bền vững”, *Tạp chí Đông Nam Á*, 2026-01-19, <https://tapchidongnama.vn/nghi-quyet-80-nen-tang-va-dong-luc-phat-trien-van-hoa-ben-vung/>.

② “Báo cáo chính trị của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khóa XIII tại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XIV của Đảng”, *Hệ thống Tư liệu-Văn kiện Đảng*, 2026-02-11, <https://tulieuvankien.dangcongsan.vn/bo-chinh-tri-ban-bi-thu-ban-chap-hanh-trung-uong/dai-hoi-dang/lan-thu-xiv/bao-cao-chinh-tri-cua-ban-chap-hanh-trung-uong-khoa-xiii-tai-dai-hoi-dai-bieu-toan-quoc-lan-thu-xiv-cua-dang.html?categoryId=3000412>.

③ Phan Thanh Hải, “Nghị quyết 80-Nền tảng và động lực phát triển văn hóa bền vững”, *Tạp chí Đông Nam Á*, 2026-01-19, <https://tapchidongnama.vn/nghi-quyet-80-nen-tang-va-dong-luc-phat-trien-van-hoa-ben-vung/>.

④ 赵卫华:《越南数字强国战略与中越合作》,《东南亚纵横》2022 年第 4 期,第 18 页。

⑤ 《东盟 AI 治理进入新阶段》,《环球时报》2026 年 3 月 5 日,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6-03/05/content_118362065.shtml.

⑥ “Kiện toàn thành viên Ban Chỉ đạo An ninh mạng quốc gia”, *Báo Điện tử Chính phủ* 2026-06-19, <https://baochinhphu.vn/kien-toan-thanh-vien-ban-chi-dao-an-ninh-mang-quoc-gia-10226061917275771.htm>.

割和执行碎片化问题,为平台监管、数据安全、舆论引导和文化主权维护提供组织与资源保障。

在多部门协同与立法约束的共同作用下,2021年至2025年期间,越南对脸书、油管、TikTok等境外平台上违规信息的识别与清除率明显提升,保持在92%以上。^①越南已在跨境平台内容治理领域取得一定成效,逐步从事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的常态化管控模式。

(二) 夯实文化资源控制权:平台自主与数据归属把控

文化资源控制权是数字文化主权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数字文化要素的生产、配置与收益流向。在技术民族主义视域下,战略重商动机驱动国家追求关键资源的自主可控,将核心技术、战略平台和关键数据视为不可让渡的国家资产。越南通过构建本土数字平台生态、构建自主可控的主权人工智能系统、强化数据本地化归属,积极谋求数字文化要素的自主权。

一是构建本土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在数字时代,对关键数字平台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化内容的分发与用户注意力的配置方向。越共十四大提出“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数字文化平台”^②的战略举措,表明越南文化战略从单纯的“内容管控”转向“平台生态建设”。由越南最大互联网企业VNG集团开发的即时通讯与社交平台Zalo,通过深耕本土化运营和场景嵌入,于2025年月活跃用户突破7900万,覆盖越南人口77%,超越脸书成为越南第一大社交流量入口,约20%的Zalo用户每月都会使用平台内置的人工智能功能,^③展现了其在数字内容传播的主场优势。如今,Zalo已从单一的即时通讯工具演进为集社交、支付、小程序和人工智能助手于一体的超级应用,成为越南数字文化内容的主要分发渠道。截至2025年,共1.7万个国家机关在Zalo平台上建立官方认证账号,746个单位部署了便民服务小程序,覆盖教育、医疗等公共文化服务领域。^④这意味着越南公民的日常文化消费、公共服务获取和信息接收正逐步从跨国平台向本土平台迁移。

除Zalo外, Lotus(由本土科技巨头VCCorp运营)及Mocha(由越南军工电信集团Viettel直营)等三大平台,共同构成了越南本土内容分发的传播矩阵。这些平台不仅是技术产品,更是承载越南文化资源流通的主要载体。正如海防民俗协会主席阮廷清所言:“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本土文化产品占领数字空间,国家软实力只能处于依赖地位。”^⑤换言之,只有当文化内容的生产、存储、分发和消费更多地发生在本土平台之上,越南才有可能实现对文化资源跨国流通的自主调控,获得更为坚实且可持续的制度与技术依托。

二是文化资源的数据归属把控。如果说平台生态解决的是“渠道归谁”的问题,那么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则指向“资源归谁”问题。在数字时代,用户的文化消费数据,例如审美偏好、阅读习惯、

① Bộ Văn hóa, “Thế thao và Du lịch: Gỡ bỏ trên 92% thông tin xấu độc trên Facebook, YouTube, TikTok”, *Báo Sài Gòn Giải Phóng*, 2025-12-26, <https://www.sggp.org.vn/go-bo-tren-92-thong-tin-xau-doc-tren-facebook-youtube-tiktok-post830682.html>.

② “Báo cáo chính trị của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khóa XIII tại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XIV của Đảng”, *Hệ thống Tu liệu-Văn kiện Đảng*, 2026-02-11, <https://tulieuvankien.dangcongsan.vn/bo-chinh-tri-ban-bi-thu-ban-chap-hanh-trung-uong/dai-hoi-dang/lan-thu-xiv/bao-cao-chinh-tri-cua-ban-chap-hanh-trung-uong-khoa-xiii-tai-dai-hoi-dai-bieu-toan-quoc-lan-thu-xiv-cua-dang.html?categoryId=3000412>.

③ “Zalo Used by 85% of Vietnamese, Surpassing Global Apps”, *VietnamNet*, May 31, 2025, <https://vietnamnet.vn/en/zalo-used-by-85-of-vietnamese-surpassing-global-apps-2406688.html>.

④ Benjamin Poirrier, “What is Zalo? A 2026 Complete Introduction”, *Prodima*, January 10, 2026, <https://prodima.vn/en/what-is-zalo/>.

⑤ Diệu Thúy, “Đại hội XIV của Đảng: Đưa văn hóa trở thành nguồn lực nội sinh quan trọng”, *VietnamPlus*, 2026-01-22, <https://www.vietnamplus.vn/dai-hoi-xiv-cua-dang-dua-van-hoa-tro-thanh-nguon-luc-noi-sinh-quan-trong-post1089935.vnp>.

内容互动记录等已成为一种战略性文化资源。2025年3月,越共总书记苏林在国家数据协会成立大会上强调:“数据作为重要的资源和生产资料,是数字经济的‘新能源’,甚至是‘血液’。”^①面对国民文化消费数据大量流失现状,越南启动了主权人工智能与数据大模型研发工程。

在“越南人优先使用越南产品”的政策导向下,Zalo从即时通讯应用转型为集成人工智能的“AI-First”平台。Zalo不仅自主研发了面向越南语场景的大语言模型KiLM,还将人工智能能力嵌入车载语音、生活问答、语音转文字、翻译、内容生成和图像创作等日常应用之中。例如,Kiki Info作为Zalo内置问答助手,上线1年后用户数达到100万,能够理解越南方言并提供生活、社会和公共事务相关信息。^②这些模型提升了本土平台的算法对齐能力,使其能够更准确解析越南本土的文化语义特征,为文化内容推荐、公共信息服务和主流价值观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Zalo的转型既呼应了国家层面的数字文化主权诉求,也体现出企业自身在国内市场中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商业逻辑。

与此同时,越南军用电子电信集团Viettel开发了参数规模达1200亿的越南语大语言模型VT-Super-120B-A12B,旨在构建能深度理解越南数据、语言 and 知识体系的主权人工智能系统,致力于将母语和本土数据转化为面向政府与企业的实用化应用,为文化安全提供坚实支撑。^③与Zalo面向日常应用场景的人工智能生态不同,Viettel所研发的大语言模型更倾向于国家级人工智能基础能力建设。Zalo的日常应用级人工智能生态与Viettel形成互补,助力越南在语言数据处理、文化语境识别和算法分发能力上的本土化布局,降低对西方主导的算法体系的技术依赖。

(三) 掌控文化价值传播权:以数字公民培育为核心的认同建构

文化价值传播权指国家对文化内容生产、价值传播和认同建构的主导能力,即“谁来讲故事、谁来塑造认同”。在技术民族主义视域下,国家主权向数字空间延伸的核心问题在于在跨国算法主导的传播格局中“由谁来讲述国家故事、如何维系民族认同”。越南将战略重心置于“人”这一主体上,通过培育兼具“技术、文化、政治”三重属性的数字公民,构建多层次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护体系。

一是技术赋能,奠定传播权落地的能力基础。所谓数字公民是指“具有数字能力、法律意识、数字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在数字空间上创造价值的同时坚守政治和文化认同,能够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主体”^④。2026年1月,“数字公民”首次正式写入越共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培育“在道德、智力、民族意识、公民责任、尊崇法律、创新能力、审美、体魄、生活技能、职业技能和数字技能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越南人”^⑤。报告首次系统勾勒了“越南社会主义新人”画像,将传统素质(道德、智慧、

① “Tổng Bí thư Tô Lâm: Thu hút FDI chọn lọc, đừng để Việt Nam thành bãi rác công nghệ”, VTC News, 2025-01-15, <https://vtcnews.vn/tong-bi-thu-thu-hut-fdi-chon-loc-dung-de-viet-nam-thanh-bai-rac-cong-nghe-ar920496.html>.

② “What Are Some AI Applications Developed by Zalo?”, Vietnam.vn, April 12, 2026, <https://www.vietnam.vn/en/dau-la-nhung-ung-dung-ai-duoc-phat-trien-boi-zalo>.

③ “Viettel huấn luyện mô hình AI chủ quyền tiếng Việt 120 tỷ tham số, đạt hiệu suất thuộc nhóm dẫn đầu cùng quy mô”, Viettel Ai, 2026-05-29, <https://viettelai.vn/tin-tuc/viettel-trains-120-billion-parameter-vietnamese-sovereign-ai-mode>.

④ Ngọc Bích, “Chuyển đổi số quốc gia: Tăng cường phổ cập kỹ năng số cho cộng đồng”, VietnamPlus, 2022-10-13, <https://www.vietnamplus.vn/chuyen-doi-so-quoc-gia-tang-cuong-pho-cap-ky-nang-so-cho-cong-dong-post823535.vnp>.

⑤ “Báo cáo chính trị của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khóa XIII tại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XIV của Đảng”, Hệ thống Tư liệu-Văn kiện Đảng, 2026-02-11, <https://tulieuvankien.dangcongsan.vn/bo-chinh-tri-ban-bi-thu-ban-chap-hanh-trung-uong/dai-hoi-dang/lan-thu-xiv/bao-cao-chinh-tri-cua-ban-chap-hanh-trung-uong-khoa-xiii-tai-dai-hoi-dai-bieu-toan-quoc-lan-thu-xiv-cua-dang.html?categoryId=3000412>.

体魄)、现代能力(创造、审美、生活与职业技能)与数字素养(数字技能)融为一体。数字技能不仅指计算机操作能力,更包括批判性获取信息、创作内容、传播知识、保护数据隐私及辨别虚假信息的综合判断力。

为提高公民的数字能力,越南政府大力推广数字普及活动。越南自2022年开始设立社区“数字扫盲分队”,不到半年即成立逾6.15万个数字社团,培训骨干近28.4万人。截至2022年9月底,超11.7万名干部接受数字化转型培训,课程累计访问近16万次。^①这种嵌入基层的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偏远地区技术普及难题,将国家的技术治理网络延伸至基层社会,为基层数字化能力的持续积累提供支撑。此外,2025年3月,越南在推进全民数字扫盲运动中,上线由公安部与河内理工大学共同开发的政府电子学习门户(binhdanhocvuso.gov.vn),提供网络安全、电子商务等领域的3000多门课程供民众学习,旨在推动越南在电子政务、数字经济和智能社会方面的全面进步。^②在这个过程中,公安部在培训体系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这体现出越南数字普及活动的独特性,即把公民数字技能养成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实现数字化学习与意识形态安全相互结合,从而在社会微观层面为安全性和传播权的落实奠定社会基础。

二是文化铸魂,锚定传播权的运行方向。技术是赋能的工具,文化认同是决定公民数字行为的价值归属。越南通过将“国家文化价值体系”深度嵌入社会微观单元,旨在建立抵御文化逆差与算法侵蚀的“防火墙”。

越共十四大宣告越南进入“民族崛起新纪元”,将构建越南文化价值体系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同步推进“越南国家价值体系、文化价值体系、家庭价值体系和越南人行为规范”,建设“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先进越南文化。^③在此基础上,越共中央《80号决议》进一步强调文化价值观必须深度融入政治、经济、国防、安全及外交等各个领域,“重视家庭、学校、社会及文化机构体系的陪伴角色”,构建多维联动的社会文化生态。^④在该背景下,家庭被确立为防范文化代际传承断层的第一道防线,家庭教育被视为塑造国家认同的稳固基石。^⑤越南于2025年出台“数字家庭”建设指南和评估标准,通过提升家庭成员的数字素养,在家庭内部对年轻一代的数字行为和消费进行健康引导,筑起了一道融入日常生活的隐性文化防线。^⑥

越南在国内普及主流文化价值的同时,组建线上的“文化大使”团队,向海外推广具有本土文化IP和国际竞争力的数字文化产品。这些做法得到了越南学界的肯定,如越南学者武锦丽所言,国家数字文化主权的强弱,最终取决于能否在数字生态中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数字内容

① Ngọc Bích, “Chuyển đổi số quốc gia: Tăng cường phổ cập kỹ năng số cho cộng đồng”, VietnamPlus, 2022-10-13, <https://www.vietnamplus.vn/chuyen-doi-so-quoc-gia-tang-cuong-pho-cap-ky-nang-so-cho-cong-dong-post823535.vnp>.

② “Prime Minister Launches Digital Literacy for All Platform”, Hanoi Times, March 26, 2025, <https://hanoitimes.vn/prime-minister-launches-digital-literacy-for-all-platform.645251.html>.

③ 潘金娥、潘西华:《越南构建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逻辑与考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2期,第87页。

④ Phan Thanh Hải, “Nghị quyết 80-Nền tảng và động lực phát triển văn hóa bền vững”, Tạp chí Đông Nam Á, 2026-01-19, <https://tapchidongnama.vn/nghi-quyet-80-nen-tang-va-dong-luc-phat-trien-van-hoa-ben-vung/>.

⑤ 陈海丽、陈元中:《激发民族团结的力量源泉:越南文化家庭建设及启示——以西原恐怖袭击事件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24年第1期,第37页。

⑥ “Hội Liên hiệp Phụ nữ xã ra mắt mô hình ‘Gia đình số’”, Cổng thông tin điện tử tỉnh Lạng Sơn, 2026-04-14, <https://dinhlap.langson.gov.vn/tin-tuc-su-kien/hoat-dong-cac-xa-thi-tran/hoi-lien-hiep-phu-nu-xa-ra-mat-mo-hinh-gia-dinh-so-.html>.

生成与传播链条。^①

三是政治立基,建立文化传播的安全屏障。数字公民的塑造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将对国家政治体制和执政权威的认同,转化为数字空间中的守法行为。越南通过将“法律底线、党纪高线、军事专线”有机结合,在虚拟疆域中构建起一套较为严密的政治防御体系。针对全体公民,越南国会通过持续完善《网络安全法》,划定了清晰的基本行为边界,明确禁止编造传播谣言、发布反政府言论、损害国家形象及实施网络犯罪等行为,为数字秩序提供了刚性的制度支撑;针对作为执政中坚力量的党员群体,越共中央于2021年专门颁布了“第37号党员禁令”,要求越共党员在社交网络空间发挥政治与道德的模范表率作用。^②此举旨在通过将党内政治审查机制内化到党员的日常网络言行中,使党员干部成为网络舆论空间中维护政治安全的重要力量。

除了刚性的法纪约束,越南将军队的政治工作触角延伸至算法主导的社交媒体空间,于2016年组建了“47号力量”(Lực lượng 47)。该力量由越南军队内部精通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在脸书、油管等跨国平台上驳斥与越南官方立场相悖的言论,服务于其官方舆论导向。^③

在上述制度框架的基础上,越南进一步将爱国主义、自立自强等传统政治话语进行数字化转译,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在越共十四大“增强文化抵抗力,抵制一切文化侵略”的政治动员下,^④越南政府鼓励民众优先使用如 Zalo、Lotus 等本土数字平台,在数字消费中支持本国产品,引导民众把日常数字消费流向本土生态,使个体数字实践与国家主权目标形成互动循环。

五、结语

在全球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当下,“全球南方”国家正面临着数字空间“去疆域化”与文化主权流失的严峻挑战。越南的数字文化主权建构是一项由国家主导的系统性工程,将网络空间的主权维护延伸至文化治理、资源控制与价值传播3个维度。在文化治理权层面,越南将数字文化安全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议程,以立法构建与跨部门协调机制为支撑,逐步强化对数字文化空间的规制能力;在文化资源控制权层面,通过以 Zalo 为代表的本土平台崛起、本土语言人工智能模型的自主开发来降低越南对跨国平台的结构性依赖;在文化价值传播权层面,越南通过技术赋能、文化铸魂、政治立基等多元路径培育数字公民,将传播权的行使由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落实为公民的日常数字实践,实现认同建构的微观化与常态化。

在“全球南方”国家于现代化浪潮中寻求融合自身文化传统、塑造独立叙事的背景下,越南的数字文化主权构建实践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具有参照价值的国别经验。其一,技术民族主义

① Vũ Cẩm Lệ, “Chủ quyền văn hóa số Việt Nam: từ thách thức nền tảng đến chiến lược quản lý”, *Tạp chí Quản lý nhà nước*, 2026-06-20, <https://www.quanlynhanuoc.vn/2026/06/20/chu-quyen-van-hoa-so-viet-nam-tu-thach-thuc-nen-tang-den-chien-luoc-quan-ly>.

② Thi Thanh Phuong Nguyen-Pochan, “State Management of Social Media in Vietnam”, *The Russian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Vol. 5, Issue 1S, 2021, pp. 23-33.

③ “Phát huy vai trò Lực lượng 47 trong đấu tranh trên không gian mạng”, *Cổng thông tin điện tử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2026-06-30, <https://dangcongsan.org.vn/sonla/tin-tuc-hoat-dong/phat-huy-vai-tro-luc-luong-47-trong-dau-tranh-tren-khong-gian-mang.html>.

④ “Báo cáo chính trị của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khóa XIII tại Đại hội đại biểu toàn quốc lần thứ XIV của Đảng”, *Hệ thống Tư liệu - Văn kiện Đảng*, 2026-02-11, <https://tulieuvankien.dangcongsan.vn/bo-chinh-tri-ban-bi-thu-ban-chap-hanh-trung-uong/dai-hoi-dang/lan-thu-xiv/bao-cao-chinh-tri-cua-ban-chap-hanh-trung-uong-khoa-xiii-tai-dai-hoi-dai-bieu-toan-quoc-lan-thu-xiv-cua-dang.html?categoryId=3000412>.

不仅是一种产业政策取向,也可以转化为后发国家在数字空间维护文化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与合法性资源。其二,“全球南方”国家在无力根本改变全球技术权力结构的现实约束下,选择在数字文化这一技术门槛相对低的领域寻求突破,具有政策的合理性。其三,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组织动员能力与意识形态整合机制,使其能够调动较自由市场经济体更为集中的国家力量投入数字文化主权建构,形成独特的“国家主导型”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文化主权的维护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更是文化理念、治理模式和国民认同的系统性建构,其成效将影响国家在数字时代的文化安全与长远发展。

越南的上述实践路径具有鲜明的体制性特征。越南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一党执政结构和组织动员能力,使其能够以更高的行政效率推进数据本地化、平台属地化和公民数字素养普及等一系列治理举措。同样,与越南情况类似的印尼,其脸书用户占总人口的 72.5%,^①用户规模与渗透程度同样面临跨国平台主导本土信息生态的困境。然而,二者在治理路径上却呈现明显差异。印尼的多党民主体制、地方分权结构和开放市场竞争环境,使其数字文化治理更多依赖市场激励机制和分散化的社会组织力量来推动本土数字内容发展,而非采取越南式的自上而下国家强力动员。因此,越南的实践价值不在于提供可直接移植的标准方案,而在于提供一种思路,即后发国家在数字文化这一技术门槛相对低的领域,可以通过国家意志的集中表达实现“主权超车”。处于不同体制条件下的国家,仍需依据自身的治理资源禀赋,探索与本国国情相适配的路径。

[责任编辑:占 冰]

The Construction of Vietnam's Digital Cultural Sovereignty: A Techno-Nationalist Perspective

CHEN Haili¹, BAI Ruchun²

(1.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6, Guangxi;

2. School of Global and Reg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 digitalization, the erosion of digital cultural sovereignty has become a shared dilemma for Global South nations. As a fast-growing latecomer in Southeast Asia, Vietnam faces multifaceted challenges, including cross-border platform regulatory deficits, massive data outflow, and weakened cultural identity. Driven by techno-nationalism, Vietnam has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ed its digital cultural sovereignty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reclaiming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hrough strategic upgrades and legislative synergy, reducing structural dependence on transnational platforms by fostering a native platform ecosystem and localizing data assets, and nurturing digital citizens to rebuild the state's capacity in identity construction. Vietnam's practice demonstrates that Global South countries can achieve sovereign “leapfrogging” in the relatively low-tech threshold domain of digital culture,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other developing nations.

Key words: Vietnam, digital cultural sovereignty, techno-nationalism, digitalization

^① “Social Media Users in Indonesia at the End of 2025”, NapoleonCat, <https://stats.napoleoncat.com/social-media-users-in-indonesia/2025/>.